



赵昌智 主编
广陵书社

扬州文化研究论丛

第二辑

The Research Forum of Yangzhou Culture

扬州文化研究

论丛

第二辑

The Research Forum of Yangzhou Culture

赵昌智 主编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扬州文化研究论丛. 第2辑 / 赵昌智主编. —扬州: 广陵书社, 2008.11

ISBN 978-7-80694-369-4

I. 扬… II. 赵… III. 文化史—扬州市—文集 IV. K295.3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9467 号

书 名	扬州文化研究论丛. 第2辑
主 编	赵昌智
责任编辑	胡正娟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文昌西路双博馆附二楼 邮编 225012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jss@163.com
印 刷	扬州机关彩印中心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625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94-369-4/K·159
定 价	36.00 元

《扬州文化研究论丛》编委会

顾 问：祁龙威

名誉主编：薛庆仁

主 编：赵昌智

副 主 编：丁 毅 田汉云 曹永森 朱福炷

顾 风 曾学文

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韦明铨 王永平 王章涛 向 前

许卫平 刘建臻 陈文和 夏 峰

钱宗武 顾 农 黄继林

目 录

清代扬州学派研究

- | | | |
|----|----------------------|---------|
| 1 | 由训诂以明义理——读刘台拱《论语骈枝》 | 祁龙威 |
| 5 |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与阮元《儒林传稿》 | 戚学民 |
| 22 | 双峰并峙两通儒——阮元与焦循的学术关系 | 王章涛 |
| 37 | 论《广雅疏证》之撰成 | 张其昀 |
| 54 | 论清代《墨子》考证的历程与成就 | 田汉云 陈晓东 |
| 70 | 《清史列传》中扬州学派史料刊误十六则 | 刘建臻 |

文选学研究

- | | | |
|-----|--|----------------|
| 74 | 《文选》李善注“善曰言”的解释和五臣注以及现代注释之间的关联
——以《文选》卷二十二谢灵运的诗的解释为中心 | 佐藤正光(著) 钱剑锋(译) |
| 85 | 曹宪事迹著述系年 | 胡耀震 |
| 94 | 重读鲍照《芜城赋》 | 顾 农 |
| 101 | 李审言先生文选学述略 | 孔祥军 |

维扬艺文

- | | | |
|-----|------------|-----|
| 109 | 清代关于扬州的杂书 | 来新夏 |
| 114 | 《扬州画舫录》校后记 | 陈文和 |

- | | | |
|-----|---------------------|---------|
| 119 | 匠心独运的金农雕版艺术——宋纸明墨印本 | 刘向东 |
| 127 | 释读吴让之与赵之谦的印学交流 | 祝 竹 |
| 140 | 陈汝衡书札 | 韦明铎(辑注) |
| 160 | 《散曲丛刊》的文献学价值 | 曹明升 |
| 168 | 清代弹词在扬州的传播 | 童李君 |

书 评

- | | | |
|-----|------------------------|-----|
| 174 | 《张謇日记笺注选存》读后 | 汤志钧 |
| 179 | 历史是一种精神——读余大庆《鉴真传法东渡记》 | 李建明 |
| 182 | 扬州文选学研究的新收获——评顾农《文选论丛》 | 陈延嘉 |

文化名人

- | | | |
|-----|---------------------------|-----|
| 188 | 为清史研究心心相印——记祁龙威与戴逸半个世纪的友情 | 沈秋农 |
| 191 | 徐铉谪居泰州年月考 | 俞 扬 |

典籍选刊

- | | | |
|-----|------|-----|
| 194 | 邗故拾遗 | 刘师培 |
|-----|------|-----|

由训诂以明义理

——读刘台拱《论语骈枝》

祁龙威

由训诂以明义理,反对“凿空”说经与“株守”古注,这是清儒戴震所倡导的读经方法论。乾嘉时,扬州诸朴学家奉行此法,撰成了大量有意义的著作,承先启后,其中包括宝应刘台拱的《论语骈枝》。

清代朴学家奉顾炎武为鼻祖。当明清易代之际,有识者深痛明季士大夫“空谈心性”,无补时局,导致亡国之祸,力求学术更新。风会既开,异人应运而生。炎武登高一呼:“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①,号召学者舍弃宋明语录而返求救世济民的真道于孔孟遗经。他又指明了务实的治学途径——读经必先识古字,而古书多同音假借字,故识字必先审古音。“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②炎武著《音学五书》,取明陈第考证《毛诗》古音之法:“刻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它书也。二者俱无,则婉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这实际是人类考察事物的归纳比较法,它与近代科学相通。于是以经学为中心,以小学(语言文字学)为工具,以考证为方法的一代朴学,于焉兴起。

乾隆、嘉庆之际,朴学达到鼎盛阶段。惠栋、戴震先后继起,提出取代宋学的纲领,即由训诂以明义理,反对凭胸臆的“凿空”说经,具见于戴氏《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等文章中。惠、戴否定有人谓汉儒重训诂、宋儒重义理的说法,而坚持训诂与义理不能分裂,读经必由训诂以明义理。但惠、戴也有差别。惠栋志在复兴“汉学”,而戴震则谓汉儒也有附会,不能“株守”汉诂,当断以己之律令,讲求实事求是,以故戴氏所创建的,已非古老的“汉学”,而是新

①《与施愚山书》。

②《答李子德书》。

一代的“清学”。乾嘉及以后众多扬州学者,慕戴氏之风而起,精心渺虑,诂释经传,刘台拱是其中之杰。

台拱是清乾嘉扬州学派的老辈之一。其同侪汪中为李惇撰《墓铭》云:“是时古学大兴,元和惠氏、休宁戴氏咸为学者所宗。自江以北,则王念孙为之唱,而君和之,中及刘台拱继之。”刘氏姻家阮元所作《刘端临先生墓表》记乾隆二十一年(1756)台拱入都应礼部试,虽不第,但少年绩学,名倾京师。“是时,朝廷开四库馆,海内方闻缀学之士云集。先生所交游,自大兴朱学士筠、歙程编修晋芳外,休宁戴庶常震、余姚邵学士晋涵、同郡任御史大椿、王给事念孙并为昆弟交。稽经考古,旦夕讲论。先生齿最少,每发一议,诸老先生莫不折服。”戴门高第王念孙撰《刘端临先生遗书序》,盛赞台拱正确的读书之法及其精湛的成就,云:“盖端临邃于古学,自天文、律吕至于声音、文字靡不该贯。其于汉宋诸儒之说,不专一家,而惟是之求。精思所到,如与古作者晤言一室而知其意指所在。比之徵君阎百诗、先师戴庶常、亡友程易畴,学识盖相伯仲。以视凿空之谈,株守之见,犹黄鹄之与壤虫也。”台拱虽博学多发明,但生前未及时裒辑。嘉庆十年(1805)台拱歿后,其婿阮常生奉父命刊刻的《刘端临先生遗书》,仅有三种三卷。其后陆续增辑至九种八卷,详见刘宝楠代阮恩海所作《刘氏遗书书后》。《论语骈枝》一卷,是其中的说经专著。

《汉书·艺文志》言:“《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重视《论语》,或尊之为《六经》的钤辖,或奉之为治世的准绳。自汉迄宋,注释《论语》者不下千家,而带有时代性总结的有二家:一是综合汉魏古注的何晏《集解》;一是综合宋理学家言的朱熹《集注》。朱《注》为元、明、清功令所尊,在经学领域尤居统治地位。清汉学家多讥评朱《注》。台拱撰《论语骈枝》,不拘汉宋门户,既反对宋学凭胸臆凿空说经,也不株守汉学旧注,坚持由训诂以明义理,达到实事求是。所著虽仅一卷,然启发一代《论语》学者,影响深远,兹举例以见大略:

(一)坚持正确的古义不可废

《论语·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欤?’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诗·卫风·淇澳》之篇朱《注》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朱熹此说,与《尔雅》释《诗》的古义不合。《论语骈枝》驳之云:“谨按,《释器》云:‘骨谓之切,象谓之磋,玉谓之琢,石谓之磨。’《释训》云:‘如切如磋,道学也;如琢如磨,自修也。’《三百篇》古训古义存者矣!独此二句,则此章问答之旨,断可识矣。盖无谄无骄者,生质之美;乐道好礼

者,学问之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学。而七十子之徒独称颜渊为好学。颜渊而下,颖悟莫若子贡,故夫子进之以此。然语意浑融,引而不发。子贡能识此意而引《诗》以证明之,所以为‘告往知来’。《集解》及皇、邢二《疏》并鹘突不分明。而朱《注》不用《尔雅》而创为己精益求精之说,推是义不过以切琢喻‘可也’,‘磋磨’喻‘未若’,比例虽切,而于圣人之意初无所引申,何足发‘告往知来’之叹?况此例句法,本篇即有‘如金如锡’、‘如圭如璧’。”综计全经,“如山如阜”、“如冈如陵”之类,不下十数句,皆一字一义,不以缀属联贯为文。以是推之,《尔雅》旧义恐不可废也。

(二) 申说汉诂,破除困惑

《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何晏《集解》:“郑曰:‘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故不可有所讳。礼不诵,故言执。’”皇侃《义疏》失郑注本意,而云:“谓孔子平生读书皆正言不为私所避讳也。”邢昺《正义》复述郑注大意,未作解释。朱熹《集注》不顾“雅言”古义,别创新意云:“雅,常也。执,守也。《诗》以理情性,《书》以道政事,礼以谨节文,皆切于日用之实,故常言之。礼独言执者,以人所执守而言,非徒诵说而已也。”又云:“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于如此,若性与天道则有不可得而闻者,要在默而识之也。’”刘氏以为郑玄注得经文本意,他申说“正言其音”以发千古之蒙。《论语骈枝》云:“谨按,雅言,正言也。郑注谓‘正言其音’者,得之。”“夫子生长于鲁,不能不鲁语,惟诵《诗》、读《书》、执礼三者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训典,谨末学之流失。”“昔周公著《尔雅》以篇,以释古今异言,通方俗之殊语。刘熙《释名》曰:‘尔,昵也,昵,近也;雅,义也,义,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为主也。’”“雅之为言,夏也。孙卿《荣辱篇》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又《儒效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然则雅、夏古字通。”盖谓雅言乃周王都中夏之言。

(三) 搜取佚注,择善而从

《论语·述而》:“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何晏《集解》:“莫,无也。文无者,犹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犹人者,言凡文皆不胜于人。”皇、邢二《疏》均株守《集解》,训莫为无。朱熹《集注》:“莫,疑辞。犹人言不能过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则全未有得。皆自谦之词而足以见言行之难易缓急,欲人之勉其实也。”刘氏以为以上诸家实因不解“文莫”为何意,故对经文的阐说都属牵强附会。《论语骈枝》辨之云:“杨慎《丹铅录》引晋栾肇《论语驳》曰:燕赵谓勉强为文莫。又《方言》曰:侔莫,强也。北燕之外郊,凡劳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谓之侔莫。谨按,《说文》:忞,强也;慎,强也。忞,读若旻。文莫,即忞慎,假借字也。《广雅》亦云:文,勉也。黽勉、密勿、𪔐没、文莫皆一

声之转。文莫，行仁义也；躬行君子，由仁义行也。”栾肇，字永初，高平人。晋广陵太守。见皇侃《论语义疏序》。栾肇著《论语释疑》十卷，见《隋书·经籍志》。《隋志》又云：“梁有《驳序》二卷，亡。”

以上三例表明，读经若解诂不准，则说理也必不确，以故读经必由“训诂以明义理”，《论语骈枝》就是奉行这一方法论的产物。后儒继之，俞樾著《续论语骈枝》，章炳麟著《广论语骈枝》，其渊源皆自刘台拱。而《论语》学得其从侄宝楠、从侄孙恭冕发扬光大，正如《清儒学案·端临学案》所云：“宝应刘氏代有闻人。端临邃于经学，考证名物，研精理义，未尝离而二之。所著《论语骈枝》，精深谛确，能发先儒所未发。楚桢、叔俛父子继之，遂成《论语正义》一书，尤称有功经训。有清一代治《论语》学者，盖以刘氏为集大成矣。”治清代扬州学派者当留意焉。

作者工作单位：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与阮元《儒林传稿》

戚学民

阮元负责辑撰的《儒林传稿》是清代第一部学术正史,成稿后传播较广,对后世的学术史论著以及今日成型的清代学术史叙述有多方面的影响。揭示该书影响的各个方面,既有助于清代学术史叙述的研究,也有利于对晚清学术史的深入,而学界对此问题似尚无足够的关注。本文以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为阮元《儒林传稿》的影响所在的具体个案,以此显示《儒林传稿》、《国朝先正事略》等晚清学术史著作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个中的思想史价值;同时通过分析《儒林传稿》在《国朝先正事略》中的角色,初步解释前者的影响为何不为今人所重的原因。

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六十卷是清代人在清代完成的一部综合性的大型人物传记资料,其中收录了清朝开基至同治200余年间1108位人物,分名臣、名儒、经学、文苑、遗逸、循良、孝义七类。它流传较广,在《清史稿》、《清史列传》等问世之前是研究清代历史的重要参考之一。梁启超曾将其列入国学基本书目^①,称“李次青之《先正事略》,道光以前人物略具,文亦有法度,宜一游览,以知最近二三百年史迹大概”。也有人认为它“在综合性的清人物传记的建设中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和承先启后的作用”,“至今仍不失为研究清史的一部重要著作”。^②《国朝先正事略》中《名儒》和《经学》两类传记一向是研究清代学术史的重要资料,尤其为学界所重视,对近代学术研究有相当的影响^③,至今也是学界常

①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第4237页。

②易孟醇:《后记》,李元度著:《国朝先正事略》,湖南:岳麓书社,1991年。

③梁启超本人撰写《清代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就曾参考《国朝先正事略》。又比如近代中日两国学者都曾通过《国朝先正事略》了解崔述的情况。顾颉刚就曾说他十二三岁时通过家藏的《国朝先正事略》最早知道崔述其人,为其日后进一步研究崔氏的机缘。见《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中国哲学》第二、六辑,第6、7页。而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等也是通过《国朝先正事略》得知崔述,从而刊行崔氏著作。有关情况请参阅钱婉约:《“层累地造成说”与“加上原则”——中日近代史学之古史辨伪理论》,《人文论丛》(1999年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用的史料之一。

《国朝先正事略》作为传记资料的价值学术界较为熟稔,但是其本身的学术史和思想史价值也很重要。该书中的《名儒》和《经学》诸多传记与《儒林传稿》的诸多联系,实是其思想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可凡此均未有人注意和研究。本文揭示,《国朝先正事略》的《名儒》和《经学》实受到阮元《儒林传稿》多方面的影响。后者对前者的宏观层面的指导意义更加值得重视,阮著具体文字的直接影响似乎不明显,但是传记中的附注实有为李氏提示材料来源和线索的作用,而阮著整体的学术史描述更成为作者纠正唐鉴《学案小识》和江藩《汉学师承记》的门户之见的基本依据。《国朝先正事略》的学术史论述显示了阮元《儒林传稿》在晚清时期的重要影响,也说明了清代学术史叙述形成的复杂过程。就阮著的影响力而言,其学术史宏观叙述地位的上升和具体文字重要性的下降并存,意味着《儒林传稿》的认知朝着抽象化和概念化方向发展,也预示着其本身被后世“遗忘”的命运。



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名儒》和《经学》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多方面的价值,其中清代学术史论述意义尤其重大,但是以往学界对此研究不多,少数论述也有欠准确^①,其症结在于没有弄清《名儒》和《经学》的学术史论述的渊源。正如研究者注意到的,《国朝先正事略》曾参考借鉴多部著作,比如《汉学师承记》、《碑传集》等。^②但是似乎没有人注意到阮元《儒林传稿》对它施加的重要影响,而这是深入理解《国朝先正事略》学术史论述的关键。

有多条证据表明李元度事先看过阮元的《儒林传稿》。第一,《国朝先正事略》中多次提及阮元的《国史儒林传》以及其中的情况,显示作者知晓阮氏此书,且

①朱维铮注意到《国朝先正事略》的学术史论述的意义,但是他认为曾国藩和李元度将毛奇龄算为汉学始祖是打击汉学,则是错误的,原因在于没有注意到李元度说法实本于阮元的意见。笔者将在后文论述此点。“从方东树后,自命理学者流都坚持把毛奇龄说成清代汉学第一人,那理由在学术史以外。由曾国藩作序表示完全肯定的他的幕僚李元度所编《国朝先正事略》,《凡例》中称本朝经学分两派,其专宗汉学以抵程朱之隙者,毛西河、惠定宇、戴东原诸先生也;其义理宗程朱、仍博稽汉唐注疏者,李安溪、方望溪、姚姬传诸先生也。不待说曾国藩、李元度肯定的正统,当然是李光地的传人方苞、姚鼐。他们将被惠、戴两派公认翻覆无常的人物毛奇龄,硬派作清代汉学始祖,那涵义也不言而喻。这段历史陈述的微妙区别,至今未见注意。”《汉学师承记·导言》注,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②易孟醇的出版《后记》中写到点校《国朝先正事略》时,参考了《碑传集》、《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清史列传》和《清史稿》这几种文献,而没有提到阮元的《儒林传稿》,可知点校者没有注意到阮氏《儒林传稿》对《国朝先正事略》的影响。

对它的情况比较熟悉。比如《凡例》中说：“各事迹皆采自私家传志，郡邑志乘，间及说部，仍正以国史列传。”鉴于阮元《儒林传稿》就是国史的一个部分，他当然也借鉴了此稿。同时李元度也表示他的著作仿照国史编撰的成例，无一字无来历：“阮文达创《国史儒林传》，皆就各家记述，集句成篇，仍分注所出之下……是编采书较多，未暇一一注明所出，然实无一字无来历。”^①他提及的阮元《儒林传稿》的体例，当然意味着他参阅过该稿。又该书卷三十四《经学》的《顾震沧先生事略》提及“乾隆四十八年，诏修《国史儒林传》，首举先生名，谓如顾栋高辈，岂可不为表章？馆臣遂创《儒林传》，以先生为始。其见重如此”。^②阮元的《儒林传稿》确实以顾栋高为首，这也可以说明李元度参阅过前者。又《张皋文先生事略》中说：“阮文达居馆职时，创立《国史儒林传》，其《序》述前代师儒分合及本朝理学、经学诸儒源流甚晰，而亟称近世张惠言之于孟虞《易》说，与孔广森之于《公羊春秋》，皆为专家绝学。”^③这里提及的确是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中的内容。这些说明李元度确知《儒林传稿》的存在。

鉴于阮元的《拟国史儒林传序》、《凡例》和部分被剔除人物的传记已经收入《擘经室集》，恰好也覆盖上述事项，是否李元度只看过这些，而不是《儒林传稿》全书呢？《国朝先正事略》中多条确切的证据揭示，作者不仅仅了解阮著，而且确实参照过此书。

第二，很多人物正传后有附传，而很多正传和附传的组合方式和阮元《儒林传稿》相同，而这些编组方式本于阮元个人的看法，其他的私著在这些人物的编组方面或者不同于阮著，如《汉学师承记》和《学案小识》（绝大部分传记），或者是参阅过阮元的《儒林传稿》后的模仿行为（如《学案小识》中戴震后附凌廷堪就是仿自阮元）。《国朝先正事略》中《顾震沧先生事略》后面的附传是吴鼎和梁锡珣，次序与《儒林传稿》略同（《儒林传稿》中《顾栋高》后附三人为陈祖范、吴鼎、梁锡珣）。而且《汉学师承记》中并无顾栋高的记载，更无所谓附传人物，所以这里的人物组合只能借鉴阮元的《儒林传稿》本传。《国朝先正事略》正附传人物的多处组合与《儒林传稿》相似，如顾炎武后附张弼、吴任臣；阎若璩后附李恺；毛奇龄后附陆邦烈；胡渭后附叶佩荪、黄仪、顾祖禹（《儒林传稿》胡渭后附顾祖禹、叶佩荪）；钱澄之后附方中通；朱鹤龄后附陈启源；江永后面附汪绂、金榜；卢文弨后附孙志祖、丁杰等等。这些人物正附传组合方式都与《儒林传稿》相同或者相似。这些相似或相同不能视为简单的巧合，应是李元度曾参阅《儒林传稿》的证据。

第三，《国朝先正事略》某些传记的文字与阮元特有的记载相同，更是作者参考阮著的明证。李氏承认“遍阅本朝人文集”，“遇伟人事迹，辄手录之”（《自

①以上引文均见《国朝先正事略·凡例》。

②③《国朝先正事略》，第946页、第1014页。

序》),而未曾明言直接采用国史文字。但是他也说“采私家传志”,“正以国史”(《凡例》),也暗示了他自己曾参阅国史,其中就包含阮元《儒林传稿》。就《国朝先正事略》的《名儒》、《经学》类传来说,很多地方实际直接承袭了阮元《儒林传稿》的文字。比如在介绍顾栋高学术的部分,李著《事略》文字与阮元大同小异。如《顾震沧先生事略》:

先生所学,合宋、元、明诸儒门径而一之,援新安以入金谿,为调停之说。著《大儒粹语》二十八卷,又著《春秋大事表》百三十一篇,条理详明,议论精核,多发前人所未发。《毛诗类释》二十一卷,采录旧说,发明经义,至为谨严。又《尚书质疑》二卷,《四库书题要》谓其多凭臆断,盖先生穷经之功,《春秋》为最,《书》则用力少也。^①

阮元《儒林传稿》的相应文字是:

……所学,合宋、元、明诸儒门径而一之,援新安以合金谿,为调停之说。著《大儒粹语》二十八卷,又著《春秋大事表》百三十一篇,条理详明,议论精核,多发前人所未发。《毛诗类释》二十一卷,采录旧说,发明经义,至为谨严。又《尚书质疑》二卷,多凭臆断,不足以言心得,大抵栋高穷经之功,《春秋》为最,《书》则用力少也。《提要》。^②

两相对照,李元度文所介绍著作的次序和内容都和阮文高度相似,而评价《尚书质疑》的文字也从阮元那里得到创意,将阮氏注所引用的文字稍加变易,变夹注为直引,前者从后者演化以来的痕迹非常明显。而且《儒林传稿》有顾栋高的传,《汉学师承记》并无同名传,所以这是李元度曾借鉴《儒林传稿》的明证。

而此情况并非孤例。我们在很多《儒林传稿》和《国朝先正事略·名儒》、《经学》同样收录的人物传记中都能看到这样的相似。如《顾炎武先生事略》后附张弼事略:

力臣名弼,山阳人。精六书,贫而嗜古,尤究心金石,搜讨靡遗。尝登焦山,乘江潮归壑入岩下,仰读《鹤铭》,证为顾况书,援据甚核。后以聋废,而考证弥勤。亭林《音学五书》,力臣所定也。”^③

阮元《儒林传稿》同名传记是:

①《顾震沧先生事略》,《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四,第946页。

②阮元:《儒林传稿》,《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12页。

③《顾亭林先生事略》,《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七,第815页。

张昭字力臣,山阳人。精六书,贫而嗜古。《曝书亭集》。尤究心金石,后以聋废,而考证弥勤。《提要》。顾炎武《音学五书》,力臣所定也。见本书。^①

两者相对照,李文沿袭阮文的情况非常明显。特别是“贫而嗜古,尤究心金石”,貌似简单的两句,原先并非自然连缀在一起,实是阮元辑出连属成文。也就是说除了参考阮文,李元度不可能如此凑巧地和阮元有相同的文字组合(只是去除掉阮文的注)。这也是李元度曾参考阮元《儒林传稿》的铁证。

又《毛奇龄先生事略》后附《陆邦烈事略》:“弟子陆邦烈、盛唐、王锡、章大来等,著录者甚众。邦烈字又超,平湖人。尝取先生经说所载,为《圣门释非录》五卷,谓圣门口语未可尽非云。”^②

阮元《儒林传稿·毛奇龄传》附《陆邦烈传》:“奇龄弟子陆邦烈、盛唐、王锡、章大来、邵廷采等,著录者甚众,李塨最知名。廷采、塨自有传见本传及《四库全书提要》。邦烈字又超,平湖人。尝取先生经说所载诸论,为《圣门释非录》五卷,谓圣门口语未可尽非也。《四库提要》”^③此处后者与前者非常相似,而且陆邦烈除了阮元《儒林传稿》收录之外,其他的如《学案小识》和《汉学师承记》并无记载,因此这条也是李元度曾参考阮元著作的有力证据。

其他的类似还有多处,比如《朱愚庵先生事略》^④文字与《儒林传稿》同名传记大同小异^⑤,更可以说明《国朝先正事略》与《儒林传稿》的密切关系。

第三,某些具体人物的传记文字和阮元有所差别,但是其事迹的编排创意和文字连属方式,明显源自《儒林传稿》,这也可以从侧面证明作者受到阮元的影响。如《顾震沧先生事略》先引用邹一桂的《顾栋高墓志》叙述传主的生平,次引用《四库提要》介绍传主的学术,其编排材料的次序和阮元如出一辙(不同的是,阮元注明了材料的出处,而李元度没有注明)。这也可以说明,李元度参考过阮元的文字。

因此,李元度在编撰《国朝先正事略》时,肯定参阅过阮元的《儒林传稿》。而《儒林传稿》的刊刻和传播情况也为李元度提供了可能。阮元曾经通过周围的人有意传布其《儒林传稿》,比如,他曾经将稿本给了汪喜孙^⑥,《儒

①③阮元:《儒林传稿》,《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第633页、第641页。

②《毛奇龄先生事略》,《国朝先正事略》,第920页。

④《朱愚庵先生事略》,《国朝先正事略》,第921页。

⑤《朱鹤龄传》,《儒林传稿》,《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第658~659页。

⑥汪喜孙:《尚友记》,杨晋龙编:《汪喜孙著作集》(中),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4年,第713页、第717~853页。如《刘先生台拱家传》中说:“阮督部《拟儒林传稿》云:‘研程朱之学,以道自绳,书数、音韵、天文、律吕、名物、义理,莫不穷考冥搜。事亲以孝养。’”其他如《张编修惠言家传》等等,《汪喜孙著作集》(中),第764页、第804页。

林传稿》的分纂者也从阮元那里传抄该书^①,唐鉴则从国史馆得到史馆的定本的抄本。^②不过抄本的流传范围毕竟有限,流传广的还是刻本,嘉庆年间就已经出现了《儒林传稿》(四卷本)的刻本,道光年间也有刻本。这些刻本的出版情况不明,但是我们推测它们都出于阮元本人的同意,应该是合理的。同治年间则在北京出现了名为《国史儒林传》(二卷)的史馆定本,其内容与阮元的稿本有相当的差异,此中情况容作者另行撰文研究。因而,李元度在同治年间编撰《国朝先正事略》时是很有可能获得某一个刻本的。而从编辑工作的角度说,他在居乡的数年时间便完成六十卷数量多达1108人的传记,没有一些参照和依据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阮元借助国史馆的力量有多种方便,而且有人担任分纂的情况下,三年左右时间也才撰成一百余人的传记。《国朝先正事略》仅《名儒》和《经学》部分收录的人就较阮元为多。没有借鉴,这样大的工作量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

《儒林传稿》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两个版本系统:一个是以稿本为基础的四卷本《儒林传稿》系统,一个是以国史馆定本为基础的二卷本系统《国史儒林传》。这两个系统的传本相较,四卷本基本忠实于阮元原稿本的面貌,而国史馆定本经过多处删改,剔除了毛奇龄、张惠言、孔广森等人,已经不是阮元呈缴的面目。在李元度撰写《国朝先正事略》时,这两个系统的《儒林传》都已经面世。因此,弄清李元度参考的是哪个版本系统非常重要。从有关文字的比较来看,李元度参考的应是接近阮元原稿面貌的四卷本,而非以国史馆定本为基础的《国史儒林传》。这一点和以国史馆定本为基础的唐鉴的《学案小识》是不同的。因为毛奇龄被剔除出国史馆定本《儒林传》之外,其附传弟子陆邦烈自然也被剔除。而《国朝先正事略》中就有《陆邦烈传》,且文字和阮文略同。而如果说《毛奇龄传》可以从《擘经室续集》看到的话,《顾栋高传》和《朱鹤龄传》都未被剔除,而《国朝先正事略》的《顾震沧先生事略》与《朱愚庵先生事略》传文同样略同于《儒林传稿》的同名传记。其中《顾震沧先生事略》中的“乾隆四十八年,诏修《国史儒林传》,首举先生名,谓如顾栋高辈,岂可不为表章?馆臣遂创《儒林传》,以先生为首”^③,就是《儒林传稿》中的话,而《学案小识》没有此话,国史馆定本《儒林传》则不以顾栋高为首,而是以顾炎武启始。《朱愚庵先生事略》中有:“性好学,遗落世事,晨夕一编,行不识路

①“参与《儒林传》分纂的钱恬斋由翰林出守澄江,过家上冢,泰吉抄得《儒林传》稿,盖恬斋得之于仪征阮公者,恬斋亦与分纂也。《文苑》则尚未汇稿。后数年于汪小米处见之,潘梧君蔼人因借抄其副。昨岁梧君下世,其册归唐氏,泰吉乃属钟署香、潘稻孙为抄此本。道光乙巳十月初七日,钱泰吉记。”《跋》,《文苑传拟稿》卷末,王章涛著:《阮元年谱》,黄山书社,2003年,第599-600页。

②唐鉴的《学案小识》大量运用了阮元《儒林传稿》以及以阮元为基础的《国史儒林传》定本。参阅拙文:《论阮元儒林传稿对唐鉴〈学案小识〉的影响》。

③《顾震沧先生事略》,《国朝先正事略》,第946页。

途,坐不知寒暑,或谓之愚,因以愚庵自号。尝笺注杜子美、李义山诗,故所作韵语,颇出入二家。入国朝,屏居著述,与顾亭林友。亭林以本原之学相勖,始湛思覃力于诸经注疏及儒先语录。”^①这一段文字与阮元《儒林传稿》相同,^②而与《国史儒林传》差别很大。^③又《陈泗源先生事略》与《儒林传稿·陈厚耀传》大致相同,而其中有“与梅穀成同修书,尝召至御座旁,教以几何算法,厚耀学益进”一句,^④国史馆定本《儒林传》和《学案小识》都没有,却是《儒林传稿》中的原话。由上可知,李元度参阅的是阮著四卷本《儒林传稿》。

二

如前所述,李元度参阅过阮著《儒林传稿》,而《儒林传稿》对《国朝先正事略》的《名儒》和《经学》部分的具体影响还值得进一步分析。本文认为,阮著对李书从微观到宏观,从文字到观念、框架都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在微观记载的层次,《儒林传稿》文字的直接影响似乎不大,但是实际上阮元传记提供了重要的、具体的线索,对后者的编撰工作具有实际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在宏观的层面,《国朝先正事略》又接受了《儒林传稿》的清代学术史论述的主要观点。

就微观层面而言,《国朝先生事略》和《儒林传稿》的关系比较微妙。单纯就文字而论,《儒林传稿》的具体行文对《国朝先正事略·名儒》和《经学》的影响似乎不大。如前文所引诸文所显示,很多传记如果不是和《儒林传稿》进行仔细的比较,读者不会发现两者在文字上的关联。我们再以《顾亭林先生事略》的情况来说明此点。《顾亭林先生事略》体现了李元度兼采各家的特色,也同样似乎说明阮元的具体文字影响力并不大。李元度将顾炎武列入《名儒》,显然承接了唐鉴的观点,不以顾为经学人物,但是他也没有像唐鉴那样,连篇累牍地征引材料,辨顾氏学宗朱子,而是主要表彰其行谊。至于顾氏生平的具体记载,李元度主要依据的是《汉学师承记》,加上部分唐鉴《学案小识》的文字和小部分阮氏辑录的文字。其论学的文字:

先生耿介绝俗。双瞳子,中白而边黑,见者异之。最与归庄善,少共游复社,有归奇顾怪之目。于书无所不窥,尤留心经世学,历观廿一史、明十三朝

①《朱愚庵先生事略》,《国朝先正事略》,第921页。

②《朱鹤龄传》,《儒林传稿》,《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第658-659页。

③《国史儒林传》卷上。按《国史儒林传·朱鹤龄传》的文字系将阮元的文字重新组合而成。按其同样的文字是:“尝笺注杜甫、李商隐诗,盛行于世,故所作韵语,颇出入二家。入国朝,屏居著述,晨夕一编,行不识途,路坐不知,或谓之愚,因以愚庵自号。”而在“与顾亭林友。亭林以本原之学相勖,始湛思覃力于诸经注疏及儒先语录”一句之前,将阮文的另外一段文字插入。

④《陈泗源先生事略》,《国朝先正事略》,第930页。